

食品安全威胁下社会自我保护的三个场景： 一家两制、食物主权与替代模式^[1]

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北京 100872, 中国)

提要:在道德日渐崩坏的年代,人类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合力建造了一个向神挑战的巴别塔。食物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扭曲了农业属性和食物基本功能,引发了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本文展示了一家两制、食物主权和替代模式这三个社会自我保护的场景,说明了以再次嵌入为努力方向的集体行动,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这些集体行动有其必要性,也有其有限性,需要被认识和引导。以伸张食物权利为主的人类自我救赎运动,需要被引导为仰赖神的恩典的救赎与怜悯的道德重建运动。一个可以考虑的框架是 CFRC(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以重新恢复人与神,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应有关系,促进食物体系由有限的社会自我救赎,转向仰赖神的恩典和怜悯的整全的救赎观。

关键词: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一家两制、食物主权、替代模式

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100872 北京,中国。电子邮件:zhouli@ruc.edu.cn

当年的巴别塔,如今在人类的诸多领域耸立。在许多社会场合,我们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记 11:3-4)

的确,在人类的诸多学科领域,都分门别类地建立起诸多耸立的学术巴别塔,作砖(如学术名词及作品)并烧透了不断建设城与塔(如各个学科大厦),每个学科似乎都有自己是真理,甚至终极真理的宣示,也传扬着鼻祖、大师、学派等各个所谓伟大的名字。

本文将说明农业经济的学科领域,有一场与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社会运动正在兴起。其中的重要背景,是无公德个人、原子化个人、自我主义等道德崩坏的出现,使得农业和食物的本质被扭曲,将农业和食品体系日渐成为逐利的工具,从而脱离自然和社会(波兰尼所谓的“脱嵌”)。这座巴别塔的建造,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建造、又与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它揭示了每个独立的个人始终要面临的三重关系(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出现了道德危机。当食物体系脱嵌于社会和自然后,引发了食品领域里的一场具有人类自救性质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

本文将介绍这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三个场景:第一个是发生在中国的名为“一家两制”的“个体

[1]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威胁下的一家两制与社会自我保护研究”(项目编号:71373269)支持。
Acknowledge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funding fro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s greatly acknowledged, with the running title: “A Study on ‘One Family, Two Systems’ and Self-protection of Society under Food Safety Threats in China” (71373269).

自保”运动;第二个是世界范围内的名为“食物主权”的伸张食物基本权利的运动;第三个是风险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无公德的个人”崛起,导致权利义务割裂后,替代性的有限市场、有限信任的食物体系建设运动。

一、场景 1:一家两制

根据笔者自 2012 年起在北京、河北、甘肃等地完成的 600 多份调查问卷,在食品安全威胁下,食物体系的社会参与者正在采取行动,约 30% 的农户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一家两制”的差异化生产;有 57% 的农户和 73% 的消费者采取了“一家两制”的差异化消费。^[1]2014 年 7 月,当我们在河北一个县继续进行农户调查时,观察到 87% 的农户在进行“一家两制”的差异化生产。以“一家两制”为特点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并迅速蔓延。

“一家两制”(one family, two systems)的概念,是通过联想类比移植的方式,受中国政治中的“一国两制”概念的启发而来。依据笔者多年在农村调查的观察,作为生产与消费合一体的农户,有不少人观察到了食品安全威胁,从而在其生产和消费中,同时采用 A 和 B 两种不同的模式:A 模式是贯彻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农业生产模式(food for money),B 模式是贯彻生命逻辑的为生活而生产的农业模式(food for life)。^[2]前者常常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后者常常作为替代性的自我保护方式。农户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区分自家消费的食品(B 模式)和供应市场的食品(A 模式)。亦即,农户将安全农产品留给了自己,将不安全但却能够带来现金收益的农产品卖给了市场,由他人去消费。

另一方面,城市家庭会在食品安全威胁下,采取差异化消费的行为作出应对。通常情况下,城市消费者会在农贸市场、普通超市等主流食品消费渠道(A 模式)之外,开辟出替代消费渠道(B 模式)。大部分食物由主导性的主流食品市场取得,少部分食物消费则采取替代方案,如参加社区支持农业(CSA)、巢状市场、农夫市集,以及开辟菜园自己种植农产品等。

笔者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课题的研究框架,是基于波兰尼关于市场与社会关系之研究。以及波兰尼在《大转型》^[3]提出的“嵌入”(embeddedness 与“脱嵌”(disembedding)理论、社会自我保护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运动”理论;对于研究所涉及的农户及消费者行动的内在机制,则借用了斯科特“弱者的武器”^[4]、科尔曼“理性选择”^[5]以及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6]等理论。结合课题组的实地调查,我们建立了解释框架(见图 1),得出如下结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威胁的基础性原因,是食物市场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农业的本质被市场的逐利性目的所侵蚀;面临这种威胁的个体,以自扫门前雪的方式,进行一家两制的“个体自保”。而随着生产与消费者“无合作的联合”(combination without cooperation)的扩展,“个体自保”有转向“社会共保”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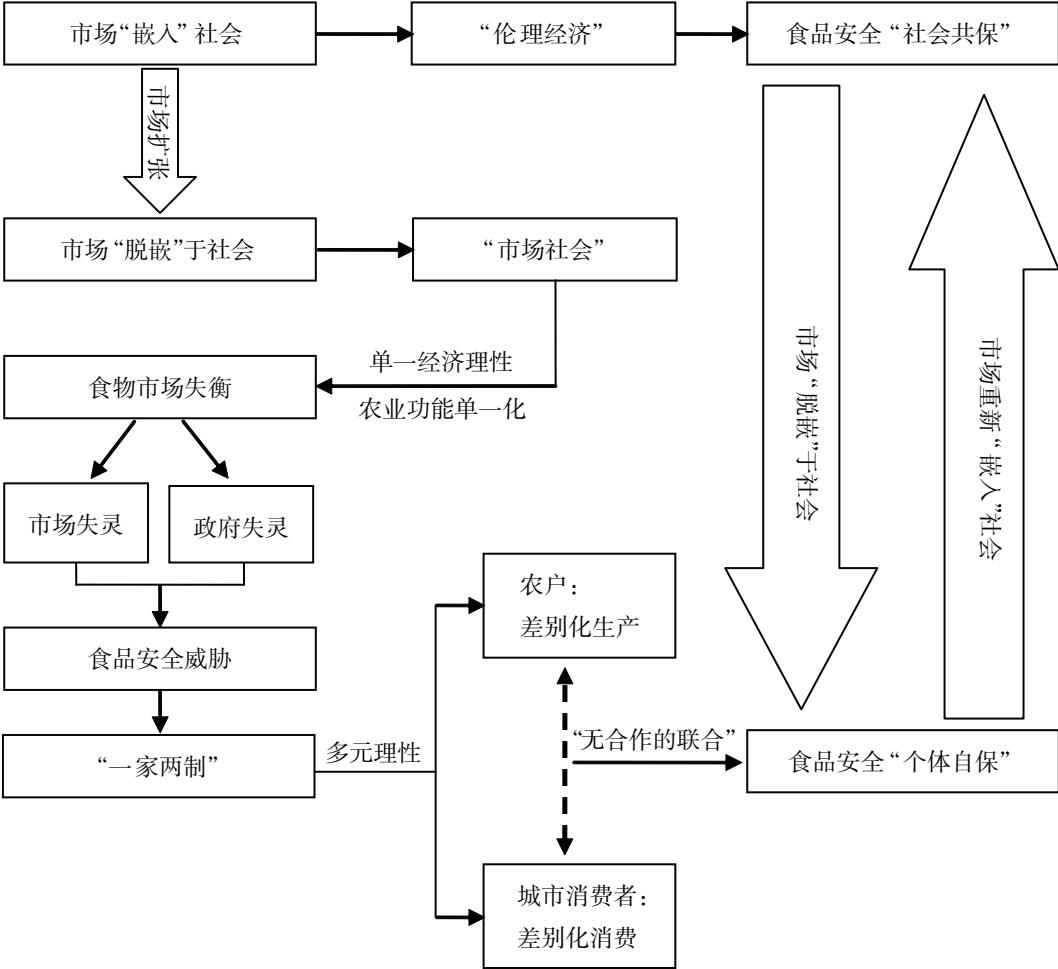


图1 市场的“嵌入”与“脱嵌”及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机制的转换

资料来源:根据波兰尼、斯科特、科尔曼、奥尔森等的理论,结合“一家两制”的研究整理并绘制。已发表,见文献[1]

二、场景2: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首先由拉美的NGO——“农民之路”于1996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提出^[7],主要指各个国家应尊重文化和生产的多样性,保持并发展自己生产基本食物的权利。后来食物主权的概念几经发展,要求生产者、消费者、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食物生产和消费,以保障安全、健康食物获得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并且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的健康发展。只有在食物主权得到保障的地方,食物才能称之为项基本的人权。

笔者也参与了世界食物主权运动在中国的引介与推动工作,参与创建了中国的“人民食物主权”网站。^[8]在2013年我们召开的中国第一届食物主权会议上,笔者阐述了如下观点:主权来自主体性的承认和权利的伸张。在食物体系中,至少有微观层面的个人和人类组织,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基础层面的造物主——神,有主体性,也有主体权利。

因此,食物主权应包括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神主权这三个层面。

(1)微观层面的人民主权。依据主体性,又包括生产者主权、消费者主权和社会组织主权这三个层次。生产者主权主要是指生产者在食物生产上的自主权利,指食物生产免受国内和国外资本和技

术的控制,能维持生计和保持世代耕作方式,并且能自主决定生产生活方式的权利。生产者主权进一步包括三个方面的权利,首先是能否进行生产的权利,其次是选择生产资料的权利,最后是如何生产的权利。消费者主权指消费者对食物的权利,它不仅指消费者能获取食物,免受饥饿、拥有尊严的基本权利,也指消费者能决定消费意向,选择消费对象,消费对自己来说健康安全且在文化传统上合适自己的食物,拥有健康的食物、合理的膳食结构,并从食物中获取幸福感的权利;社会组织主权是指社区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管理和行动方式,以促进食物生产、消费、贸易体系的可持续运作和健康发展。

(2)宏观层面的国家食物主权。这走出了军事安全等国家主权的传统安全范畴,属于新兴的非传统安全。既包括政治安全,即国家有自主生产基本食物的权利,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以及国内政治稳定、免受粮价波动的影响的权利。也包括国家免受跨国资本和技术的控制,人们维持日常生活价值,免受食物匮乏和剥夺的安全。一些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也有这样的准主体地位,以及食物主权的安排。

(3)基础层面的神主权。这通常只能在自然主权层面被接受。空气、阳光、水、种子等这些农业基本要素,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的创造物,它们是神普惠制的赐予。食物生长过程也是自然再生产主导的,任何人或者组织无法完全控制,只是极少部分地参与了维持、改造、更新的工作。问题在于,并非任何人创制的天赋食物权,却有形形色色的产权主张和利益伸张。在林林总总的争辩和主张中,拥有绝对主权的神却是沉默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进行一场漠视主体性,甚至逃避主体性的无主体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神主权不依赖于人主权的伸张而存在,他不需要参与这场讨论,他一直就在那里。

在20世纪绿色革命、市场化、资本化、自由贸易等人类主导食物体系的进程中,上述主体的食物主权逐渐被剥蚀,并且呈现出一系列问题。首先,以化肥、农药、种子、技术为代表的绿色革命,虽然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但这种过度依赖石油能源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和逻辑,使得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剥蚀了生产者主权(主要表现为生产自主权、选择权的剥蚀等)、消费者主权(由于作物品种的减少以及单一化等导致的选择权减少,大量农药、化肥、转基因食品等对人体可能造成的损害等)和自然主权(对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等),也使得国家食物主权遭到一定程度的剥蚀(国家有权保障生态的可持续、人们获得安全食品等的权利)。其次,资本对食物体系的垄断也剥蚀了各主体的食物主权,主要表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失去了食物的定价权,生产者利润得不到保障、消费者只能接受资本对食物的定价,他们是当今食物体系的弱势主体;资本对农产品的垄断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失去了种什么和买什么的权利。在跨国资本的控制下,失去本土物种的生产权利,集中表现为大豆、玉米主权的丧失。此外,补贴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得很多国家面临食物的倾销等问题,且本国生产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国家丧失食物主权(粮食政治、粮食武器)甚至影响到国家主权。此外,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受到贸易波动的影响。最后,神普惠制的恩赐,因为人们漠视、甚至是不承认神的主权,滥用修理看守的能力,夸大人改造和管理中的作用,从而有形形色色的利益伸张(比如对种子基因片段的极少的修改,便申请专利,将种子的发明与使用权利据为己有等),这些都是在回避本源性的问题。在神主权方面,生产者、消费者、社会组织都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这是食物主权问题的基础性原因。

20世纪中叶以来,新自由主义和绿色革命的兴起,侵蚀了食物普惠制的恩典,改变了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是食物主权丧失的主要原因。作为一种保护性运动,可以通过公平贸易、建立国家食物主权安全保障、倡导生态农业生产等方式,利用科技对现有食物体系进行改造。而现有的食物体系面临产权制度、资源不公平配置、饥饿、贫穷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小农的利益难以保障,因此,需要对现行食物体系进行结构化改革。也需要人们面对本源性的问题,承认神的主权,找到每个人应有

的位置,接受神的恩典,才能做好修理看守的工作。

笔者关于食物主权的分层框架,可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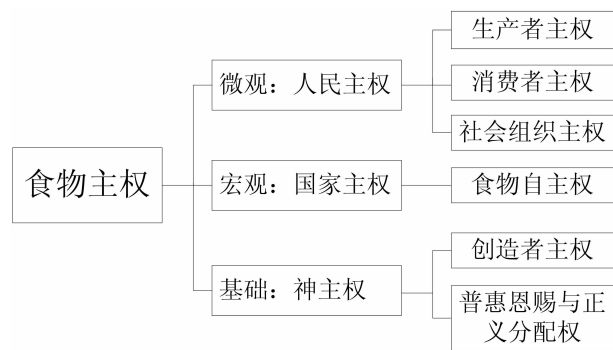


图 2 依据主体性的食物主权的分层框架

同时,食物主权运动中,科学技术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应用。联合国的一个评估计划——国际农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评估(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IAASTD)计划,在其评估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农业》(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中,建立了一个 AKST(Agriculture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重要影响。2013 年的一篇食物主权文献^[9],在综述绿色革命对世界各地影响,以及 IAASTD 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业生态学作为一种工具,认为在未来食物体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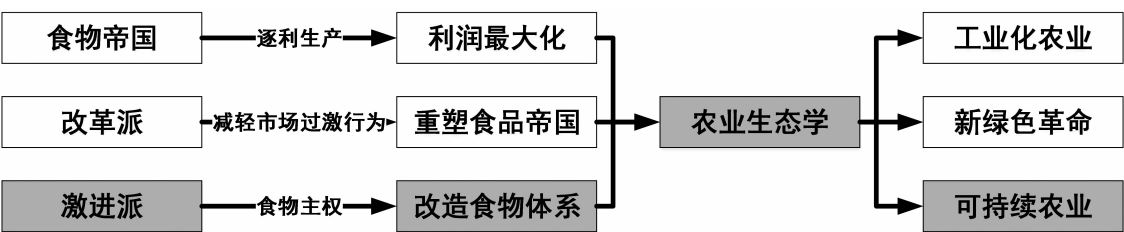


图 3 食物主权运动通过农业生态来改造食物体系

资料来源:依据如下文献绘制。Holt-Giménez E, Altieri M A. Agroecology, food sovereignty, and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13, 37(1): 90-102.

如图 3 所示,农业生态学有三种使用方式:若现有的资本主导的食物帝国,利用农业生态学可以继续延续和扩大工厂化生产方式,继续扩展工业化农业;若农业生态学与“改革派”结合,也只是重塑了食物帝国,可能会使食品帝国势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发动新一轮的“绿色革命”(如很多人宣称的,转基因已经掀起了第二轮绿色革命);食物主权的推动者主张第三种使用方式,农业生态学应与提倡食物主权的“激进派”一同推动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变革现有的食物体系,改善小农的生计,消除饥饿,推动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图 3 中,绿色线路代表了该论文作者的观点,即农业生态学与倡导食物主权的激进派需要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改造食物体系,推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模式。

三、场景 3:“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及替代性食物体系

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已经具有了贝克所言“风险社会”(risk society)^{[10][11]}的明显特征,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在整个食品生产-消费链条

上的农户、食品企业、消费者这三类主体,都处于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状态中^[12]。对于农户来说,典型的行为是“一家两制”,即将安全的食品留给自己食用,而将不安全的食品提供给市场,并通过生产企业、超市等多个渠道,摆上了消费者的餐桌。对于食品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成为食物生产与销售的最终目的,最大化的方式,主要是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在挤压农民和哄骗消费者中,获取最大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一方面是可怜的弱者,是利益受损者,另一方面又是施害者,甚至是食品不安全的始作俑者。长期以来,消费者沉浸在质优价廉的消费幻想当中,不愿意付出合理的价格,这种自私的消费理念加重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不安全的因素出在农民和食品企业的环节,但是解决食品安全,改变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情况,却应该从消费者入手^[13]。只有消费者愿意在食品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秉承公平贸易原则,愿意付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价格,才能为食物生产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为舒缓食品安全威胁,提供操作空间。比如降低从农户环节开始的以次充好的道德风险,也为食品企业提供足够的利润。理论上很清晰,但现实上很灰色。即便是一些基督徒,也有不少人缺乏公平、正义的消费理念,不愿意支付合理的价格。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运动,就是在倡导这样一种消费理念的更新。

事实上,整个食物消费是环环相扣的,即使消费者支付了公平价格,未必带来农民和食品企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状况的改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假设前提的误用。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但“理性人”明显不是人们经济行为的全部特征,何况食品生产与消费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食品不是简单的商品,食物消费亦不同于一般商品交换。食物消费的信任品属性,导致了人们需要基于信任而非算计的市场关系。“理性人”本身只体现了单一的经济理性维度,而现在需要用多元理性来突破单一的经济理性^[14],比如每个人明显还有社会理性、生存理性等,而经济理性不能超越生存理性和社会理性。经济学的改造,需要建立在多元理性的基础上。

对于社会发展的库兹涅兹“倒U曲线”模型,即社会崩坏到顶峰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状况会出现好转,这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很多研究表明,顶峰之后的好转并不能自动出现,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社会力量。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治理。每个人都负有治理的职责,都是一个管家。若能每个人认识并修理看守好自己的伊甸园,则合乎神主权的的社会秩序将会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缺乏基本的治理。所以兴起了以“一家两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通过各扫门前雪的个体自保,不少农户和城市消费者,找到了重建社会信任,舒缓食品安全的替代办法。这种替代性的努力,使得一个替代性食物体系正在兴起。

替代性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是一系列本地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存在互动的、直销形式的、非主流渠道的统称。通常的形式有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提携系统(Teikei)、箱式计划(box scheme)等。在中国,一个重要方法是农消对接——农民和城市消费者建立新的社会合作关系,实现农民与消费者的无缝对接,节省掉中间环节。以有边界的市场对抗无边界的市场^[15],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而非商业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种围绕食物体系兴起的社会运动,以波兰尼所言的“双重运动”的社会自我保护为特征。

从消费者是否参与食品生产、是否需要付费这两个维度出发,可将消费者“一家两制”模式中替代性的食品消费渠道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4):(1)消费者自己生产食品,需要为生产要素支付较高的费用,如都市农场;(2)消费者自己生产食品,不需要为生产要素付费或付费很少,如阳台种菜;(3)消费者自己不生产食品,通过支付显著高于传统消费渠道的价格,获取安全的食品,如有机食品店;(4)消费者自己不生产食品,通过与农户“农消对接”等方式支付较低费用,获得相对安全的食品,如通过巢状市场,或通过亲戚、朋友开辟另外一条安全食品通道。消费者付出的费用较低,甚至伴随着人情赠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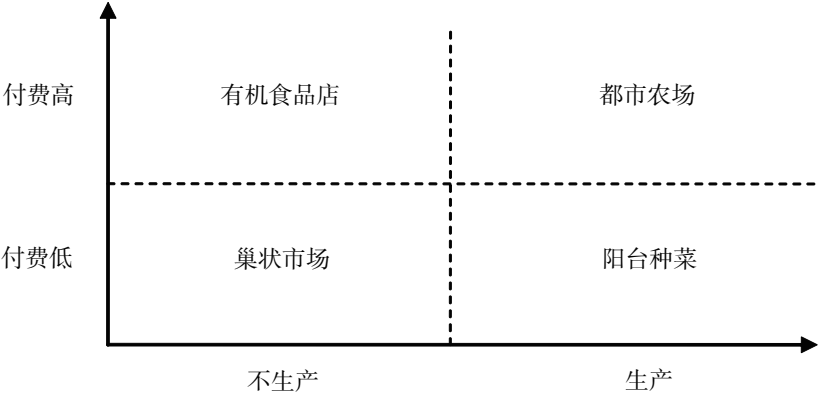


图 4 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的替代性消费渠道举例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嵌入和脱嵌的重要概念。的确，逐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利与利他也并非必然矛盾。利他并不是靠道德教化而达成的，哈佛大学的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 1886-1965) 曾经提出过自律 (autonomy)、他律 (heteronomy)、神律 (theonomy) 的思考框架。我们需要在社会分析中，借用这一框架。“自律”是依靠道德良心，“他律”是依靠制度监督，而“神律”是依靠敬畏之心。三律平衡，小到一个人的内心，大到一个社会的秩序，才是稳定和相互制衡的。现在食品安全出现了三条腿的凳子，只靠一条腿站立的局面，即他律。但法律惩戒、邻舍监督、媒体曝光等他律方式，成本极高，也无法避免监督与合谋并存的局面。因此，舒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有所作为，还应包括信仰领域的革新。三律平衡，是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

笔者针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展开了食物体系的研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框架 (见图 5)，并写作发表^[13]。图 5 显示，在主流的基于自由贸易的食物体系中，消费者、食品企业和农户三类群体之间建立了一套畸形的食品交易机制：消费者普遍压缩主流食品消费渠道中的价格支付，追求“价廉”和“物美”兼得，且将“物美”与“卖相好”等同。食品企业一方面“对上欺”，为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欺压生产端，压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收购价格，对食品的卖相进行重点加工，甚至不惜以质量安全为代价；另一方面，食品企业“对下骗”，努力迎合消费者“价廉物美”的消费理念，以争取货币选票。受此诱导，农户进行“一家两制”的差别化的农产品生产，将生产成本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留作自家消费，将生产成本低、卖相好、质量不安全的农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和食品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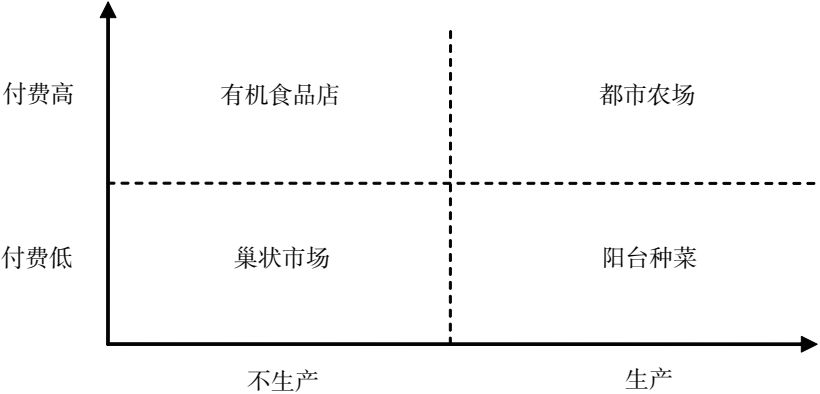


图 5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飞去来器”效应

不难发现，这套主流食品交易机制的运行结果，是消费者从农户和食品企业获取质量不安全的食品或农产品，农户不可避免地提供，同时也消费不安全食品，甚至食品企业员工也不可避免地消费来

自农户和其他食品企业的不安全食品或农产品。由此可见,消费者、食品企业和农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且消费者带有“无公德个人”(uncivilized individual)性质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直接诱导了食品企业和农户的行为,在整个体系中施加了基础性的影响。三类群体的联合行为共同导致了食品安全领域“飞去来器”(boomerang effect)效应的爆发,食品安全威胁日益加剧,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就此形成,社会中没有任何一方从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中受益。

四、CFRC 框架下的解读

当然,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不应仅仅满足于只发挥鲁迅式的“匕首”与“投枪”功能。作为有责任、有信仰的研究者,还应提供“银针”和“手术刀”这样的治疗方案。在科学体系的项目设计下,笔者提出了基础性(以社会农业改变脱嵌的社会基础)、体系性(以食物主权改造农业和食物体系)和替代性(提供各类即时可以参与的替代模式)这三个依次递退的策略性方案。但也知道这三个节节退守的方案,只是科学体系中十分有限的努力。一旦我们认识到道德崩坏是食品安全威胁和人类自我保护的基本背景,一个本源性的治疗方案,就呼之欲出了:重建道德体系,以改变食物体系逻辑的前提。

如何重建道德体系?需要认识到人并非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唯一主体,而只是此生的模仿性的有限主体(借用时亮博士 2014 年 7 月的会议发言),人类不能自我赋予生命和价值,更加无法对农业和食物体系赋予生命与价值。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万物和道德的本源,唯有《圣经》告诉我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 24:1)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植物、生命要素,都由神而来,自然、农业、食物和人本身,首先要认识这一讨论问题的本源性前提。

借着 CFRC 框架,我们可以认识农业的创造(Creation-神学视角下的农业的创造及其功能)、堕落(Fall-人类堕落之后,农业目标和手段的扭曲)、救赎(Redemption-基于圣经的真理观对农业的改造,以回归公义和真理)和成全(Consummation-从永恒的角度看待我们在地上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为农业和食物体系的问题,寻找“银针”和“手术刀”。

从创造角度看,农业和食物,自伊甸园的创设起,就是神的恩典,神赐给人的礼物和工作(创 2:8-16)。很明显,农业以自然再生产为主,劳动为辅,人类社会普遍流传的“劳动创造财富”,实在是虚谎之言。农业中,有恩典(如诗 65:9-13),有真理(如公义,如诗 107:33-38 阐明在农业上因罪的惩戒和因回转而得祝福,还有勤劳与遵循自然之道,如传 11:6)。农业本来具有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

但是,人类堕落了。在农业领域,逐渐将农业和食物生产中的自然规律优先,替代为工业生产规律优先,不断将市场规律,凌驾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上,从而建立了一个以逐利为目的的食物帝国,将农业的目标和手段,都扭曲为玛门的规则。食品产业链中的诸多潜规则,淹没了神的恩典与真理。甚至形成了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巴比伦世界系统。^[16]竞争和逐利,成为农业和食物生产的主旋律。

农业需要救赎,正如人类需要救赎一样。重新认识农业中基本的恩典和真理,将农业转向神所赐下的本来面目——神的恩典和真理,人的感恩和回归真理。其中,食物体系社会自我保护的运动,一方面是对农业及食物体系扭曲的纠偏,另一方面也具有不完全性。各类 B 模式的努力,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人类自身的不完全,已经决定了这场自我救赎运动的有限性。需要类似道成肉身的农业科学,道成肉身的学术努力,才能回归农业的本质。道成肉身的方式,首先是接纳和认同,认识、理解和参与农业科学、农业经济,以及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其次是革新,以真道对农业科学、农业经济和社会自我保护“行割礼”,通过这样的革新性行动,为有限的自我救赎,转向整全的本源性救赎,做出

努力。

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成全,在如下条件下能够达成:通过道成肉身的努力,将一个个“无公德的个人”,转换为“有公德的个人”;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转换为“有组织的负起责任”;将“有组织的制造风险”,转换为“有组织的应对风险”……当然,我们无法期待一个完全的地上天国的实现,只能在每个人的本分上不要失去长子的名分,在每个人的责任上不要像始祖亚当夏娃那样的诿过卸责,使得神的完全的救恩,在立志回归的不完全的人身上,得以完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展示食物体系中三个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场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食物体系的巴别塔,是每个人都参与建造的,无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无人可以推卸责任。需要认识到自己在食物体系中修理看守的责任,守住本分,从而为食物体系的回归耶路撒冷,做出自己的努力。

2. 一家两制、食物主权和替代模式,这三个食品安全威胁下社会自我保护的现象,近些年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理解为食物体系脱嵌于自然和社会后,努力进行再次嵌入(re-embedding)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有其必要性,也有其有限性。这些社会运动需要被认识和引导,以伸张权利为主的运动,需要被引导为 CFRC 框架下,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的运动。

3. 人类始终无法回避三重关系(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需要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做出解答。在第一重关系上,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神的恩典,和神的公义,需要感恩和殷勤做工,修理看守自己的伊甸园。在第二重关系上,每个人在神创造的自然面前,需要首先认识和遵从自然之道,让社会规律服从自然规律,让市场规律服从社会规律,否则,一个拜玛门的世界系统,会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第三重关系上,需要认识到农业和食物体系的交换,不是单一经济理性可以解释,更不是主导的法则,从这种“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熙熙攘攘的忙碌中,抽身出来。从单一的经济理性,回归到农业与食物体系的多元理性(至少包括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下,社会互惠的重要性。从而为认识和推动这场社会面对市场侵害,而做出的自我保护运动,进行自觉性的努力。道德崩坏之后,需要道德重建;道德重建的基础,需要回到道德原点。

就笔者而言,道成肉身的学术努力,是在农村发展领域致力于推动实践经济学的形成,以走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狭隘的二分法,为实事求是地认识人类经济活动,回归应有之道,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徐立成,周立,潘素梅. “一家两制”: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社会自我保护.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5): 32-44

[2] 周立,潘素梅,董小瑜. 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粮食属性、AB 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20-33

[3] [英]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黄树民,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5] [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册)》,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6][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Via Campesina. (1996). The right to produce and access to land. Rome, Italy.

[8]人民食物主权网站:<http://shiwuzq.com/>

[9]Holt-Giménez E, Altieri M A. Agroecology, food sovereignty, and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13, 37(1): 90-102

[10]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a

[11]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b

[12]周立. 极化的发展.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13]徐立成,周立. 食品安全威胁下“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消费者行为分析与“一家两制”调查.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124-135

[14]周立,方平.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待刊

[15]叶敬忠,丁宝寅,王雯. 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 中国农村经济, 2012(10): 4-12

[16]周立. 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及食物帝国的形成和扩展. 战略与管理. 2010(5-6):68-79

English Title:

Three Scenes under Food Safety Threats: “One Family, Two Systems”, Food Sovereignty and an Alternative Model

ZHOU Li

Professor,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Email: zhouli@ruc.edu.cn

Abstract: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moral tower of humanity, a tower of babel is building up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ood system. This tower is challenging the Lord's Law, replaced with the human law.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disembedding” food market, the properties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are distorted. Food safety incidents break out from time to time. Facing the severe food safety threats, a social self-protection movement has been trigger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scenes of this movement: “one family, two systems” in China, food sovereignty of the world, and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the food system. These collective actions aim for the re-embedding of the market to society. Although the effect of these efforts is quite limited, they should be leading to the right way. These efforts, while being just a human self-redemption movement to claim human rights, should be led to a moral rebuilding movement (back to the eternal redemption). The framework of CFRC (Creation-Falling-Redemption-Consummation), can help to rebuild the moral tower, and aids in regaining the normal relationships of 1) divine-human, 2) man and nature, 3) man and man. In addition, the promotion of a limited social self-redemption, (is shifted) to eternal redemption of the LORD's grace and mercy.

Key terms: food safety; social self-protection; “one family, two systems”; food sovereignty; alternative model